

贵州少数民族文学英译中的叙事建构与文化传播

——以王华《花河》英译本为例

蔡红叶

贵州大学 贵州贵阳

【摘要】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具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王华作为贵州仡佬族女性作家之一，其作品在传达地方特色故事、传播少数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莫娜·贝克的叙事建构理论，研究王华小说《花河》英译本中的再叙事。从标示式重构、人物事件再定位和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等三种重构策略出发，探讨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在英译过程中叙事的后经典构建方式。本研究旨在探索翻译实践中叙事建构的理论与方法，以期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叙事建构；《花河》

【收稿日期】2026 年 6 月 11 日

【出刊日期】2026 年 7 月 6 日

【DOI】10.12208/j.ssr.20260251

Framing narratives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n translation of Guizhou's minority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Wang Hua's *The Two Sisters*

Hongye Cai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Abstract】 As a multi-ethnic country, minority literatur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esenting compelling stories of China and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 Wang Hua is one of the female writers of the Gelao ethnicity in Guizhou. Her works help to show local stories and spread the culture of ethnic minorities to China and the world. Based on Mona Baker's narrative approach,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reconstructed story by analyzing three maj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dopted in *The Two Sisters*—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 framing by labeling and 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framing narratives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which may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overseas publicity of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Keywords】 Minority literature translation; Framing narratives; *The Two Sisters*

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宝库，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不仅能够展示地方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外译对于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对外传播，增强国民文化自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仡佬族是贵州最古老的原住民族之一，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传统，并涌现出王华、肖勤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家。生长于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的王华，其作品无疑是仡佬族地方民俗文化地域特色的结晶。正如她所言：“讲故事是我的需要，是我内心的那个故乡的需要”，“我需要在内心建立一个故乡，一个我没有愧对过的故乡，一个和我满心亲切没有隔膜的故乡。”^[7]因此，作为仡佬族文化的重要文学

载体，《花河》及其英译本值得关注。

《花河》讲述了两姐妹在时代变迁中的成长与命运，展现了贵州仡佬族地区的历史风貌、社会变迁与人情世态。该书于 2013 年获“中国作家年度佳作排行榜首位”奖。2019 年由刘祖勤与 Stephen Pomroy 合译为英文版 *The Two Sisters*。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花河》的地域文化书写、人物塑造、叙事艺术、语言特色及文学传统等方面，对其英译本的关注相对不足。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花河》译本与原著在风格与内容侧重上有着较大的不同。基于莫娜·贝克的翻译叙事建构理论，本文探讨了《花河》英译过程中采取的叙事重构策略，以期对贵州少数民族文学的海外传播提供参考。

1 叙事建构理论概述

叙事学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初专注于文本内部要素研究,后发展为强调文本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关联的后经典叙事学。随着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叙事学逐渐被引入翻译研究领域。21 世纪初,叙事学与翻译学的结合成为研究的新趋势。莫娜·贝克作为当今国际上最负盛名的翻译理论家,其提出的“公共翻译叙事”理论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叙事是我们在理解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而非发现的,这些叙事指导着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与他人的交流互动^[1,2]。贝克于 2006 年在《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中首次将叙事理论系统引入翻译研究,指出译者可通过“凸显、抑制或改写”等方式重构原文叙事^[5]。贝克的叙事概念区别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更注重叙事在语境中的动态性。她提出了四种主要的翻译叙事构建策略:时空构建、文本素材的选择性使用、标示性构建以及人物事件的再定位,为译者在目标语中重构叙事提供了理论依据。

2 《花河》英译本中的叙事建构案例研究

贝克指出:“翻译本质上是一种再叙事,即通过另一种语言重新构建事件和人物的叙事。”^[3]译者可以通过不同策略显性或隐性地强化、削弱某些叙事内容^[5]。本文以《花河》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用的文本素材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再定位三种叙事建构策略。

2.1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指通过省略或增加的方式来抑制、强调或者铺陈原文中隐含的叙事或更高一个层面叙事的某些方面,以弥合语言差异并实现原文信息与目标语读者接受程度之间的平衡^[5]。

总体来说,《花河》英译本 *The Two Sisters* 对原文进行了较大篇幅的省略和改写,其选择性采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删去地方文化细节和文化特征鲜明的内容。对于可能使目标语读者感到陌生或产生疏离感的描写,译者多采用省译策略。例如,关于花河人“生吃螃蟹”习俗的细致描写被删除;部分地方文化符号和特色词汇,如“追山匠”“太师椅”“冲雉”等也未被保留。通过弱化地方文化细节,译者降低了阅读障碍,增强了叙事的可接受性。

二是简化次要情节与人物描写。次要人物和次要情节在文学作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有着为故事

提供更丰富的背景信息,衬托主要人物,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牡丹是地主王土和巫香桂的女儿,在她成长过程中曾对父亲产生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情。而译者则省略了牡丹与父亲的情节,减小叙事的复杂性,从而将重点放在主要人物白芍和红杏的人物描写以及主线情节上,这既控制了译文的篇幅也优化了叙事的紧凑性。

三是省略部分比喻与象征细节。受语言和文化差异影响,某些具有较强文学性和象征意义的表达难以实现等效传递。译者在翻译时需要找到目标语言中能够传递相同或相似意义的表达,有时这可能意味着需要省略原文中的比喻形象。王华在其作品中极其擅长用一些奇特的比喻来说明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如“如果说生命是一条长尾巴的野兽,那它最令人害怕的肯定是尾巴而不是牙齿和爪子。王土没有被它的牙齿和爪子吓倒,被它的尾巴吓倒了。”^[6]王华用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潜在的威胁。但译文删去了这一比喻,转而直接表述人物面对死亡的种种表现。这种处理方法防止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或削弱叙事的直接效果,以增强叙事的冲击力和吸引力。

在翻译《花河》的英译本 *The Two Sisters* 时,译者通过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对原文进行了显著的省略与改写。通过删减地方文化细节、次要情节以及部分象征性表达,对原文叙事进行了重构,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保证了核心叙事的连贯性与传播效果。

2.2 标示式建构

标示性建构(Framing by Labeling)指译者可以使用与原文本不同的表达方式来识别人物、地点、群体、事件或叙事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关键因素以引导和制约我们对当前叙事的反应,从而重新构建叙事^[5]。即在翻译时,译者会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标记来引导或制约目标语读者对叙述内容的感受,以配合特定的叙事立场。书名可标示故事中的关键事件,而人物的名字则用来识别故事中的角色。书名和人名的翻译是标示式建构的主要手段。

2.2.1 书名转换

书名是书籍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它不仅直接反映了作者的创作与意图,而且还能构成潜在读者对书籍的第一印象。因此,书名在指示小说内容与主旨方面意义重大。在英语文学市场中,书名往往倾向于直接反映书籍内容的主题或主角,如 *Jane Eyre*, *The Kite Runner*。译者在翻译《花河》书名时,显然是考虑到故事主题和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花河”具有鲜明的

文化意象色彩,象征花河人生命的流动、美丽与变迁。然而,这一隐喻对目标语读者而言可能较为陌生。译者将《花河》翻译为 *The Two Sisters*, 将重点从意象转移到人物关系上,更符合目标读者的理解习惯。译本标题明确地指向两个核心人物——两姐妹,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小说的核心情节和主题。这种重构为目标语读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切入点,同时引导读者关注小说的核心人际关系和情感张力。

从标示式建构理论来看,《花河》被翻译为“*The Two Sisters*”是一种针对目标语文化和读者期待的翻译策略。这种改动通过形式上的转换,即从意象到人际关系,实现了叙述意义的重构。它突出了小说的核心主题,使得标题在目标文化中更具吸引力和传播力。同时,这种翻译策略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一定的文化意象,但在增强目标语读者理解的基础上实现了翻译的功能性。这一案例体现了翻译中跨文化意义重构的重要性以及对读者期待的敏感把握。

2.2.2 人物命名呈现

莫娜·贝克的标示式建构策略强调译者通过语言符号的选择与转换重构意义,并影响目标读者对人物和事件的认知。《花河》开篇写道:“我家那条河叫花河,两岸的女人都喜欢以花为名。比如红杏,比如白芍。”^[6]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具有鲜明的叙事功能,尤其体现了男女两类人物的身份特征与关系结构。因此,译者在人名翻译中的选择值得关注。

表1 人名翻译

女人名		男人名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白芍	White Peony	王土	Wang Tu
红杏	Red Apricot	王虫	Wang Chong
牡丹	Peony	王老在	Wang Laozai
迎春	Jasmine	周打算	Zhou Dasuan
李子	Plum	李石头	Li Shitou
梔子	Gardenia	李河水	Li Heshui
桃子	Peach	李剃头	Barber Li
梨花婶	Aunt Pear Flower	等大脚	Deng Dajiao
巫香桂	Wu Xianggui	半眼	Banyan

整体来看,译者在翻译女性姓名时主要采用意译策略。小说中女性多以花木为名,其姓名不仅对应具体植物,也隐喻人物命运与精神特质。通过意译,译者既保留了植物意象,又传达了原作的象征意义和审美意

境。例如, White Peony、Red Apricot 和 Jasmine 等译名均较好地再现了原文的叙事功能。然而,在翻译“巫香桂”这个名字时,译者选择将其音译成 Wu Xianggui。译者的这一处理方式体现了他的叙事立场。作为小说中的重要反面人物,巫香桂虽同样以花为名,却不同于白芍、红杏等女性人物所呈现出的成长与精神升华。她始终围绕权力与利益展开行动,其命运轨迹缺乏其他女性人物所具有的精神蜕变。因此,译者采用音译而非意译,在保留人物身份特征的同时,也有意弱化其与其他“花名女性”的象征关联,展现花河女性积极面貌,有利于塑造正面女性形象和民族形象。考虑到小说所要表达的女性主题,其中的男性名基本上采取音译方法,便于读者区分男女性,减少阅读障碍。

2.3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指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灵活运用时间、空间、指示词、方言、语域、特征词等语言手段,调整参与者之间以及他们与读者或听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再定位表现为两个方面:副文本的再定位和文本内部的再定位^[5]。这里,笔者将重点分析译者使用的副文本的重新定位策略。

副文本是解读文本,也是构建文本的重要形态。我们考察中国文学译介,不能忽视副文本的作用^[8]。相较于原著《花河》,译本在正文前加入了作者简介,属于副文本中译本导言的范畴。译本导言是翻译操纵的重要形式,比在文本层面的操纵程度更显著,对读者的影响更大,能从整体上影响译文的价值意义^[9]。简介中介绍了王华的的仡佬族身份和其文学成就。译者加入的作家简介这一副文本不仅提升了原作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也定位了读者心中的译本的文学价值,减轻了目标语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陌生感”,激发其阅读兴趣。

译本作家简介:

Wang Hua, female, Gelao nationality, native of Daozhen, Guizhou, began publishing works in 2001 and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 million characters. Her full length novel *Snow Bean* (also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Qiaoxizhuang*) won the 9th Junma National Ethnic Literature Award, first prize at the annual champion of literature rally racing hold by Dangdai Bimonthly, and first prize at the Guizhou Provincial Government Literature Awards. Her medium-length novel *Purple Clay Doll* won the Ordos Prize for Literature.

作为内副文本的重要内容,封面主要包含图书标题、作者姓名、出版商和风格样式等信息。封面是图书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一定程度上能够左右读者的阅读选择。好的封面能够吸引读者,为作品的形象建构和推广传播奠定基础。译者对封面内容和样式的选择代表了他们的翻译目的和聚焦中心。《花河》英译本的封面通过标题、视觉元素和文化背景等三方面对文本进行了再定位。副标题“A Powerful Portrait of Female Suffering and Endurance after China’s Liberation”(中国解放后女性苦难与坚韧的有力描述)清晰传递出小说的主题——女性

在社会动荡中的挣扎与坚韧。这一定位符合西方市场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题材的兴趣,也突出了原著的核心女性主题。“中国解放后”将原本发生在一个中国偏远地区的故事置于一个国际化的历史背景叙事框架中,在易于目标语读者理解的基础上突出译作的历史价值,使其成为译入语读者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封面背景中的罂粟花象征美丽、脆弱与苦难,这一意象强化了小说的情感基调和女性命运主题。同时,柔和的色调和清晰的字体设计迎合了英美市场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期待,传达出作品具有的文学深度和广泛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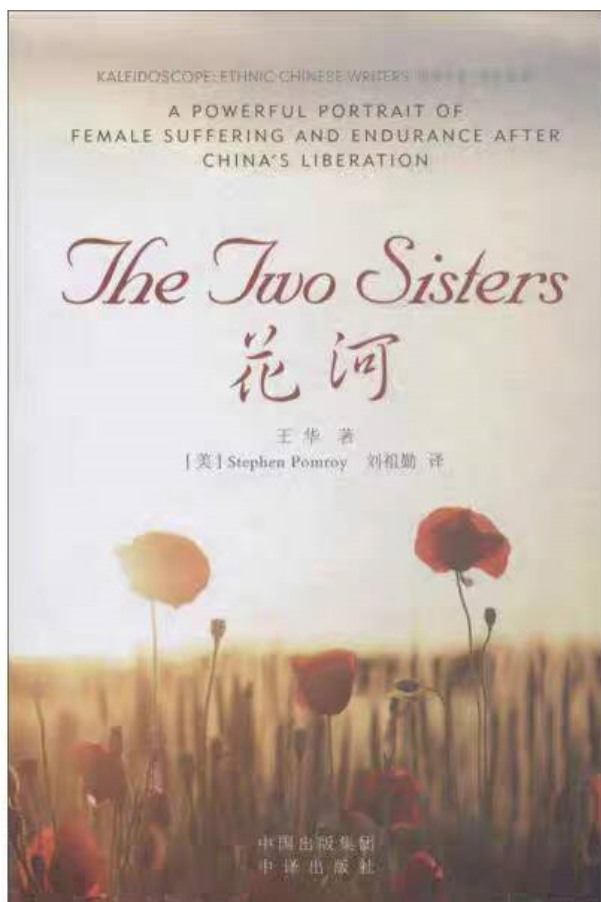


图1 《花河》英译本封面

3 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原作叙事进行重构,以回应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期待。莫娜·贝克的翻译叙事建构理论为解释这一过程提供了有益视角。通过对《花河》英译本叙事建构策略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花河》英译本综合运用了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和人物事件再定位等策略,对原作叙事进行了重构。相较于原文,译本弱化了部分地方文

化细节和次要情节,突出了少数民族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苦难经历与坚韧品质,使主题表达更加集中。其次,少数民族文学外译既需要保持原作的文学价值,又需要兼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度。译者通过适当的叙事建构策略实现跨文化意义转换,有助于增强作品的传播效果和文化认同。最后,叙事建构理论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有助于考察译者如何通过叙事重构影响目标语读者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认知。但目前关于译本海外传播效果与读者接受情况

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未来可结合海外读者反馈与接受研究，进一步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外译中的叙事建构机制及其文化传播效能。

参考文献

- [1] Baker, M.2005. Narratives in and of Translation[J]. SKASE Journal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1(1): 4-13.
- [2] Baker, M.2018.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M]. London: Routledge.
- [3] Baker, M.2014. Translation as Re-narration[C]//Juliane House. Transla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174,159.
- [4] 刘祖勤,Stephen Pomroy, 2019, The Two Sisters[M].北京: 中译出版社.
- [5] 莫娜·贝克,2011, 翻译与冲突——叙事性阐释[M]. 赵

文静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王华,2014, 花河[M].北京:人民出版社.
- [7] 王华,2017, 我内心的那个故乡[N].贵州日报,2017 年 3 月 3 日,第 12 版.
- [8] 许多,2017,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译介与接受的障碍及其原因探析[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04):97-103.
- [9] 查明建,2005,译介学:渊源、性质、内容与方法——兼评比较文学论著、教材中有关“译介学”的论述[J].中国比较文学(01):45-67.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